

大屠杀中犹太儿童的日常生活书写

——以尤里·奥莱夫的儿童小说为例

童潇骁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以色列儿童文学作家尤里·奥莱夫通过大量的生活、文化与心理细节展现了大屠杀时期犹太儿童的日常生活。他在生活细节中表现了犹太儿童个体的生活状态以及秩序崩坏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文化细节中揭示了犹太儿童面临的生存危机与身份认同危机;在心理细节中反思了大屠杀时期中正常的人性以及大屠杀给人性造成的戕害。奥莱夫的作品为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下言说大屠杀提供了范本,也为如何让儿童走出大屠杀阴影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儿童文学;尤里·奥莱夫;犹太儿童;大屠杀时期;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2-0021-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2.005

Writing about the Daily Lives of the Jewish Children during the Holocaust: Taking Children's Fictions by Uri Orlev as Examples

TONG Xiao-xi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Uri Orlev, an Israeli children's author who focuses on writing on daily life of Jewish children during the Holocaust, describes plenty of details of lives, culture and psychology. He show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Jewish childre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uman relations after the disorganization of social order. Through cultural details he also reveals the double crises Jewish children are facing—survival crisis and identity crisis,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humanity remaining in the Holocaust and the harm which the Holocaust has brought to humanity through psychological details. Orlev's works provide a model to describe the Holocaust in the context of children's fiction as well as the references on how to relieve children from the psychological shadow of the Holocaust.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Uri Orlev; Jewish children; the Holocaust; daily lives

尤里·奥莱夫是以色列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大屠杀书写者。作为那场浩劫的幸存者,奥莱夫选择将自己大屠杀时期的童年经验投射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正如他在自传性儿童小说《沙子游戏》(*The Sand Game*)所说:“我所知道的是并没有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讲述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必须假装成一个孩子才能回忆起它们。”在以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中,奥莱夫多是以犹太儿童的个人命运或是犹太家庭的逃

亡为主线,深刻地反思了战争、种族以及人性。而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大屠杀时期犹太儿童的生存状况,他的书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对于大屠杀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描写。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不仅是对历史真实性的确证与历史年代感营造的需要,其暗含了作家将宏大的历史还原为个体经验,并以此反抗权威话语的希望。二战结束后,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始终与整个犹太民族,尤其是以色列的政治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以色列通过大屠

收稿日期:2015-11-04

作者简介:童潇骁(1990—),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杀教育、对大屠杀历史的编写以及宗教的溯源等方式强化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但是其也存在着将大屠杀私有化,病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倾向。因此,奥莱夫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表现大屠杀首先是对以色列政府重塑大屠杀记忆的权威话语的一种反抗。其次,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既表现了大屠杀时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畸变,也表现了正常情人性的保存。当战争来临,原先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最先遭到破坏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与情感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儿童则是对这些改变最为敏感的群体。最后,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表达了作者对儿童回归正常生活的期盼。奥莱夫对大屠杀时期日常生活的描写提醒着读者:大屠杀只是生活暂时的特殊形态,日常生活才是永恒。

尤里·奥莱夫在作品中用大量的细节描摹了大屠杀时期儿童的日常生活。大屠杀对于儿童读者来说陌生而遥远,因此作者必须要营造出一种历史时代感。而这种时代感只能通过对当时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的描述表现出来。同时,这也是儿童感兴趣的部分。正如君特·格拉斯在《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写给纽约举办的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1979年6月)》一文中写的那样:“当最大的两个孩子问及抽象的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原因时,当父母的在解释时不得不陷入复杂的,可以在历史、社会、宗教等方面找出原因的历史进程中。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联系,其因果关系显得十分荒诞。孩子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所涉及的是日常生活,金仓鼠,电视节目以及即将到来的假期。只有当我讲述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逃亡……留在这儿将是死亡,那儿的目的地是巴勒斯坦……孩子们才竖起耳朵听。”^[1]奥莱夫在小说中主要通过生活细节、文化细节以及心理细节三个方面来表现大屠杀时期犹太儿童的日常生活。

一、生活细节

生活细节主要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在大屠杀期间,原先的生活秩序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所有人的生活状态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既能展现大屠杀中个体的生活状态,更能揭示旧有秩序崩坏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大屠杀期间,犹太人受到了

极大的迫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往往都无法得到保障,之前十分容易获得的东西现在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之前最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去做都需要倍加小心。尤里·奥莱夫在《鸟儿街上的岛屿》中就写到了主人公阿莱克斯上厕所的细节:

卫生间和淋浴被埋在了地堡里,我用不了,这真是太糟啦,因为我害怕朝街上更远的地方走去。一天一次,或早或晚,我就溜进隔壁的楼里,既然不敢在离我藏身处这么近的地方弄出冲马桶的声音来,那么我只好去人人都去的那个卫生间,将大便藏在那里,以防打劫者和告密者猜测到附近有人居住。^{[2]114}

不同于和平时期,大屠杀时期的犹太儿童即使出去上厕所都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中,为求得生存下去的机会,儿童必须快点成熟起来。因此,“我”一天只去一次和将大便埋在人人都去的卫生间里的行为不仅体现了环境的艰苦,儿童对于危险的恐惧,更体现了儿童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的逐渐成熟,开始慢慢学会保护自己。而这种成长的背后是战争逼迫下的心酸与无奈。

在众多生活细节中,尤里·奥莱夫偏重于对“食”的描写。食物解决温饱,维持着人们最基本的生存。它的重要性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大屠杀期间,德国严格限制犹太人居住区的食物供应,使得饥饿成为整个犹太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描写食物的匮乏与对食物的渴求最能表现当时犹太人处境之艰难。同时,当作为最弱势的群体的儿童也不得不自己去寻找食物的时候,这又体现了他们对生命的渴求与无论怎样都要尽力活下去的决心。寻找食物成为大屠杀时期的儿童能够生存下来所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在奥莱夫的笔下,我们看到犹太区一些的孩子会往自己的嘴巴灌肥皂沫来博得路人的同情以获取一点食物,一些孩子会去偷窃附近的商店与农庄,一些孩子会去翻找垃圾桶中的残渣剩饭。在《快跑!男孩》中,小苏利克从城中逃出来后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去寻找和处理食物。

苏利克不知道要怎么吃生鸡蛋,约瑟勒教他用小树枝在蛋的上下方各戳一个洞,再用嘴巴对准那个比较大的洞把蛋汁吸出来。^{[3]38}

他们先把比较小的黏土块从火堆里拿出来,比较大的那些必须烤久一点。黏土已经烧得像陶器一样硬,他们把黏土块摔在地上滚动,让它冷却,再用石头敲开,取出里头的鸟肉。鸟羽大都黏附在土块上,所以可以直接吃肉。^{[3]48}

奥莱夫对儿童处理生食的场景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不仅是向读者解释当时的儿童是如何处理从大自然中得到的食物,更是展示了大屠杀时期儿童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严酷的环境下,犹太儿童已经无法在城市、乡村中生存下去,他们被迫着去从自然中直接获取食物。这是犹太儿童对纳粹统治下的社会的一种逃离,更是后者对前者的一种驱逐。虽然,儿童可以自己从自然中获取食物,但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依靠的是成人的给予与施舍。很多非犹太人会在暗中帮助犹太儿童,为他们提供工作、食物与住所。这种帮助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它代表着原先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与人性尚未彻底泯灭以及原先的社会与这些放逐儿童之间的联系尚未彻底断绝。而在这种情境中,儿童会因为足够的食物而获得饱足感,并产生家的感觉。

在作品中,奥莱夫不仅描写了犹太儿童个体的生活状况,他还借助儿童的眼睛展现了大屠杀时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片段。而这些片段可以帮助儿童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大屠杀中的人性。在国家的权威话语体系中,复杂的人性往往被简化为政治或者民族利益所需要的部分。例如在以色列的语境中,犹太人就是勇敢、善良、正义的,而纳粹甚至是普通德国人往往被妖魔化、怪兽化。但大屠杀的执行人从来都不是天生性恶的人。他们与受害的犹太人一样,同样爱着自己的家人与朋友。如斯坦纳所说:“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因此,对于其他民族生活的描写有助于儿童读者超越种族、民族的限制,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并学会根据人物具体的行为对其进行道德判断。例如在《隔离区来的人》中,“我”看到了犹太警察殴打犹太男孩的场景:

那应该是在第二次偷运时看到的,因为第一次是在晚上去的,我们没有冒险出来。在此之前,我觉得只有波兰警察才会如此残忍。我从未想过犹太人也会这样,因为母亲曾经告诉

我,虽然犹太人会对陌生人(也就是指波兰人)不客气,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自己人。她说犹太人之间总是互相帮助,但是现在我却看到他们的警察和我们的警察一样坏。后来,我了解到,和我们一样,犹太人里也有告密者和叛逃者。^{[4]12}

无论是作品中的儿童还是作为读者的儿童,他们的道德判断其实都经历了这种由他律到自律的过程。“我”对犹太人之前的印象完全来自于母亲,并可以看出“我”完全信任她告诉我的一切。但当“我”真正看到了犹太人警察其实也殴打犹太人儿童的时候,便对母亲的话产生了质疑,并最终认识到其实犹太人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这既表现了儿童对父母的绝对依赖性逐渐削弱,开始学会自己做出道德判断,也隐晦地告诉了儿童读者: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里面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因此,在奥莱夫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同为犹太人的潘·格林将爸爸和“我”储藏的食物据为己有(《鸟儿街上的岛屿》),可以看到波兰人潘·克罗尔试图敲诈向犹太区走私的继父与“我”(《隔离区来的人》),也可以看到一位名叫韦纳的德军士兵则保护了犹太小男孩小苏利克(《快跑!男孩》)。

二、文化细节

文化细节主要描写的是一些犹太民族特有的习俗。两千多年以来,犹太民族虽然一直处于流散的状态,但他们在与其他文化产生冲突与融合中一直坚守着自己最核心的部分:对于犹太教中上帝的信仰以及与之相配的一系列道德伦理观念和生活习俗。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自己与这些联系起来,以共有的过去来定义自己犹太人的集体身份。在大屠杀时期,犹太人掩饰自己民族特有的习俗,以求得生存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尤其是犹太儿童,他们对于犹太身份的认同本来就并不稳固,却被迫要以其他群体的身份来伪装自己,双重身份之间极易产生认同上的混乱,甚至会使得儿童遗忘自己的犹太身份。因此,奥莱夫对文化细节的描写,除了为儿童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还揭示了犹太儿童在严酷的环境中所面对的双重危机——生存

危机与身份认同危机。

奥莱夫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细节主要是犹太人画“十”字与犹太男孩的割礼。画“十”字是天主教徒的仪式,而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是不会画十字的。因此,纳粹常以此来辨别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就不得不学会画“十”字以求自保。但是错误的画法同样也会引来致命的危险。因此,在《隔离区来的人》中,“我”就及时纠正了犹太人潘·乔泽克的错误:

我对他说:“先生,你祷告时画‘十’字的方向反了。我在教堂看到了你。如果你不会正确地画‘十’字,是会被抓起来的。”

他先假装不懂我说的话,之后看着我想了会儿说:“那肯定因为我是左撇子。”他笑了笑,我也笑了笑。

我们躲进一个门洞以防有人看见我们,然后我教他怎样画“十”字。实际上,他知道画法,只是从错误的一边开始画起。也许这真的和他是左撇子有关吧。我记得小时候分不清左右,总是通过画“十”字回忆哪只手是右手。^{[4]57-58}

奥莱夫将画“十”字的错误与左撇子联系起来,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告诉读者正确的画法。但“我”与潘·乔泽克的对话看似轻松,实则隐藏的是生命随时会陷入危险的残酷。在和平年代分不清左右并没有关系,但是在屠杀时期,分不清左右是会丧命的。如果说,画“十”字还可以学会,用来隐藏自己的身份,那么犹太男孩的割礼则是无法改变的。在《快跑!男孩》中,德国军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确证了小苏利克的犹太身份。

朱瑞克脱下裤子,用双手遮住阴茎,军官用一把尺打他的手指,把他的手扳开,然后嘲讽地说:“那这是什么?”

“我小时候受过伤,动过手术。”

“不,这表示你是个犹太人。”军官狠狠地揍了他一拳。^{[3]133}

小苏利克之前编造了一个故事,学会了如何画十字与念祷告词,但是身上所受的割礼却是无法抹去的。犹太民族在男孩出生后第八天会将其生殖器的包皮割下,并以这种方式与上帝建立联系。而只有在经历过这个仪式之后,新生婴儿才能赋予真正

的犹太身份。但在大屠杀期间,犹太民族的这个习俗却被纳粹用来抓捕与迫害他们。因此,犹太儿童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即使是与别的孩子一起游戏的时候,也不可以松懈。小苏利克就曾经因为被波兰孩子揭穿身份而再次遭到驱逐。无论是学会画“十”字还是刻意隐藏割礼留下的印记,犹太儿童伪装自己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但他们是否还能作为一个犹太人活下去呢?在《快跑!男孩》中,小苏利克重复着这样的经历:因为自己的伪装身份而被收留,不久又会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而被驱逐或是被送给德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逐渐体会到犹太身份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与磨难:被别的孩子辱骂、嘲笑;因为医生不愿意为犹太人动手术而丢失了一条胳膊。因此,在生活中,他越来越接受自己的非犹太人身份,开始淡忘自己的名字、亲人的名字等一系列可以标识犹太身份的东西,并开始通过学会祷告、画十字、佩戴十字架、受洗等方式逐渐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群体中。但一个人对于民族的认同本来就是在民族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民族文化不仅包括物质形式的文化机构,而且是一种再现体系,引导人们建构共享的归属感和同盟感。通过民族起源的神话、历史人物的民族英雄的塑造、代表景观的设计等再现策略和文学文本、大众传媒等宣传手段,民族文化以生产意义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生活。”^[5]犹太身份的确证与信仰犹太教、说希伯来语、遵守一切犹太民族的文化习俗密不可分,在生存的重压下,小苏利克刻意地抹灭了很多犹太民族的文化印记,导致空有“我是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却失去了支撑这一认同的东西。以至于当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人要接他去美国的时候,小苏利克甚至极力否认自己的犹太身份。而面对这种情况,犹太人组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唤起他的犹太文化的记忆。因此,小苏利克在孤儿院首先被暴力剥除了身上的非犹太人的印记:

莫史走向朱瑞克,伸手猛然把那条十字架和圣母像扯下来,丢进火炉里。朱瑞克吓得倒抽了一口气,他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比他有力气多了。

“有一天我要把你杀了。”朱瑞克说。

“请便。”莫史说,“你不是唯一戴着这种东

西来我们这里的孩子。”^{[3]234}

这种用暴力强行去除他人身上的非犹太印记的行为就是战后犹太民族急于重新唤起像小苏利克这样的人的民族认同感。但逼迫小苏利克将自己的双重身份切割开来的做法不仅不能弥合双重身份之间的裂缝,还将这种裂缝不断地拉大。在大屠杀期间建构起来的两个身份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相互确证的。如果小苏利克不是犹太身份,那么伪装身份就没有建构的必要;如果没有伪装身份,那么小苏利克的犹太身份也不可能得以保存。同时,伪装身份给予儿童在大屠杀时期生存下来的可能。突然的剥离会给儿童带来深深的不安全感,以致更加抗拒认同曾经带给自己无数危险的犹太身份。所以,将伪装身份的一切都遗忘既是不可能的,也违背了他们唤起犹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认同感的初衷。而想要真正重塑人们对于犹太身份的认同,就必须通过唤起儿童的文化记忆以及整合双重身份的方式来完成。

三、心理细节

心理细节主要描写的是犹太儿童的心理。由于自己在在大屠杀时期度过童年,因此尤里·奥莱夫能够较好地掌握当时的儿童心理。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精彩的儿童心理描写。这些心理细节的描写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儿童面对平常生活中也会遇到的事情的心理描写。即使是在大屠杀时期,儿童也会遇到一些在任何时候都会遇到的事情。而这种情况下的心理描写会拉近儿童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让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的孩子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会为同样的事情而感到烦恼,例如与父母之间的争吵,对于上学的厌倦,对于异性的好感……在《鸟儿街上的岛屿》中,奥莱夫就细致地描写了“我”对于女孩儿丝塔莎的思念:

整个星期我都想着丝塔莎,她一坐到窗前的时候,我就看她。她按照我要求的那样做了,一直坐在那里读书。现在,每当我看到亚奈克那个坏小子在她上学的路上吓唬她,就会气得浑身发抖。总有一天我要让他偿还的。虽然我在看着她,但也不确定这事真的就让她有那么苦恼。有时候,我又觉得她实际上挺享受这种骚扰的,而这种感觉令我更加恼火。^{[2]179}

尤里·奥莱夫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对爱慕对象的复杂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由于犹太人的身份,所以“我”无法和丝塔莎生活在一起,只能远远地看着她。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我”的情绪。看到她受到骚扰,“我”感到气愤,却又在怀疑对方是否享受这种骚扰。“我”与丝塔莎连自己是犹太人这样生死攸关的秘密告诉了对方,可见两人早已信任彼此。因此,“我”的怀疑是脱离大屠杀背景之外的情感,是一种与平常暧昧的少男少女之间无异的情绪。严酷的大屠杀并没有扼杀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反而在此刻暂时地驱散了大屠杀的阴影,让人觉得忍俊不禁之余还倍感温馨。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部分是描写儿童面对只有大屠杀时期才会遇到的事情时的心理。在大屠杀期间,儿童会遇到很多和平时不会遇到的事情。他们需要面对亲人的死亡、敌人的杀戮,甚至自己去杀人的状况。而通过这些心理描写可以让儿童读者认识到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中儿童生存之艰难。同时,体验到这些相对陌生的经验也可以帮助儿童破除很多对战争的英雄主义幻想。在《鸟儿街上的岛屿》中,“我”为了保护两个犹太起义者,用父亲留下的手枪杀死了一个德国士兵。在处理完尸体之后,“我”在弗瑞迪的怀中哭了出来:

或许,正是所有这些想要发泄的泪水才弄得我面色苍白和浑身战栗吧。我哭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止住,不过,我一直在设法不哭出声来。

我牢牢记住了爸爸给我上过的课。我用熟练的技术完成了每一个步骤,完全是按照他教我的那样,什么也不想,也不动感情。拉上手枪扳机,稳稳地握在手中。松开保险栓,准星与目标成一条直线。一分一秒也不要犹豫,思想和情感统统往后放。如果你在瞄准的当口还在想别的,你的手就会发抖,随即你就是那个死去的人。

我一直想要止住哭泣,可是我做不到。我有什么跟鲁滨孙·克鲁索不一样的呢?当野蛮人企图吃掉星期五的时候,鲁滨孙也朝他们开枪了。^{[2]134-135}

尤里·奥莱夫最后提出的问题在前面其实已经得到了解答:我和鲁滨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是战争中真实的人,鲁滨孙则是虚构出来的“英雄”即

“非人”。虚构出来的“英雄”的杀戮行为往往会被渲染为英勇的事迹,且从来不会思考被杀者的“人”的属性。鲁滨孙面对的是吃人的野蛮人,“我”面对的则是德军士兵。但这并不是将德军士兵野兽化、妖魔化,而是将鲁滨孙的行为也拉到现实的语境中进行思考: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以杀戮来剥夺他人的生命本身是否是正当的?而这段心理描写正是主人公“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也是从“非人”渐渐恢复为“人”的过程。在“我”开枪击毙德军士兵的时候,“我”放弃了“人”的情感、思想,只凭借着生物最基本的求生本能。正如爸爸对“我”的教导:如果你在瞄准的时候还在想别的,那么你就是那个死去的人。所以,举枪射击的“我”是一个放弃了情感与思想的“非人”,死去的德国军人在我眼中也只是一个对他人的生命构成威胁的存在。我们的“人”的属性在这一刻都被隐去了。作为“非人”的“我”在剥夺了他的生命之后没有任何反应。但当“我”的情感与思想都回来,渐渐恢复为“人”的时候,“我”面色苍白,浑身战栗。“我”的哭泣不仅是因为儿童对于死亡本身的恐惧,更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取消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这种行为的否定。在战争中杀死敌人或者是侵略者无疑是正当的,更何况这个德国军人正企图杀死犹太起义者。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不能承认在“非人”的状态下以暴力杀戮来取消生命的正当性。而在大屠杀时期或者是战争状态下,人总是被逼迫着不断地放弃“人”的属性,只为最简单的生存。同时,这不仅破除了儿童对战争浪漫化、游戏化、英雄主义化的幻想,也打破了政治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小英雄”形象。“现在我意识到了,真正的战争并不像历险书籍里所描写的那样,儿童像英雄似的跟大人们一同战斗着。”^{[2]133}通过对

“我”的心理描写,奥莱夫展示了大屠杀时期的犹太儿童在面对死亡与杀戮时真实的反应。无论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他们的“人”的属性的丧失必将对这“非人”的浩劫的最深刻的反思与最严厉的控诉。

四、结 语

在很多评论以战争或大屠杀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文章中,研究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此类作品不应沉溺于战争的激情,应更多地关注如何让孩子走出战争或者大屠杀,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但我们往往更多看到的是战后或者大屠杀结束之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仍然被阴影笼罩的部分,而忽略了战时或大屠杀时期孩子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这里隐藏着战后儿童无法摆脱大屠杀阴影的原因。尤里·奥莱夫的作品无疑为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下言说大屠杀提供了范本。他对大屠杀时期犹太儿童的日常生活的书写不仅表现了那个时代儿童的生存状态,表达了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愿望,更为如何让儿童走出大屠杀的阴影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 [1] 君特·格拉斯. 与乌托邦赛跑[M]. 林茄,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12-213.
- [2] 奥莱夫. 鸟儿街上的岛屿[M]. 路文彬,译.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 [3] 奥莱夫. 快跑! 男孩[M]. 李紫蓉,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
- [4] 奥莱夫. 隔离区来的人[M]. 贺爱军,徐杰林,柳欢,等译.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 [5] 王晓路.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6.

